

天 全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天全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封面题字.....	杨 超
红军攻克紫石关.....	政协文史组(1)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天全的简况.....	丹 史(1)
解放初期中共天全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工作.....	胡运费(2)
天全县血吸虫病流行记略.....	刘德天(3)
麻风病治疗成效显著.....	王正贵(4)
天全茶叶史初探之三.....	杨仁飞(6)
记抗战初期的天全抗日死难先辈.....	王永熙(10)
时代变迁的史诗.....	杨光辉(12)
记“永慎图书馆”.....	罗开极(15)
文昌宫创建述略.....	肖文瀚(17)
天全杨土司世系.....	任乃强(18)
天全历代疆域初探.....	裴大元(21)
一贯道在天全的罪恶活动.....	高子华(24)
有关天全史实的补充和质疑.....	裴大元(26)

红军攻克紫石关

政协文史组

一九三五年初冬，红四方面军沿大渡河南下，首先攻占了金汤镇，然后神速翻过了二郎山和马鞍山，途经两路口、水獭坪，翻越朱岗山直抵紫石关。这时堵截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布防在雅属地区的有：川军二十军杨森部队驻宝兴，刘湘所属教导师驻芦山（师长是杨国桢），模范师驻天全，（师长郭勋祺），刘文辉所属袁国瑞旅的李金山团两个营驻守天全以西的紫石关一带。

紫石关是一个狭窄的河谷地带，西高东低，地势险要，山高坡陡，悬崖绝壁，前有朱岗山作为屏障。只有独路一条。加之沿路又是碉堡和暗堡林立，防守严密，易守难攻。红军先攻克大、小鱼溪后，一支先头部队从悬崖绝壁上攀沿而下，犹如飞将军自天而降深入到李团紫石关的驻军地带。天拂晓时，战斗打响了，双方激战约一小时左右，红军夺取了紫石关。李团节节败退，丢盔弃甲。当李团的士兵退到离天全城二十里地时，红军已追到溃军的行列里来劝阻士兵不要逃跑，只问营长和团长在哪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被俘了。

国民党军袁国瑞亲率杨开诚团的两个营，驻在距天全西门外四里地的沙坪（即青石乡）见李团惨败退下，立即率部前往收容，并命杨团前往增援，亲自督战，稳住阵脚。夜间红军开始总攻击，袁部不待天明时就全部撤下，伤亡很大，手枪连连长罗大全被打死。当时郭勋祺师，守着天全城西禁门关口，不准袁旅退进关内，并用机枪向袁部溃军扫射，逼得袁旅部队无路可走。袁部连长雷树清在愤怒之下，率领士兵十余人不顾性命地向郭师机关枪阵地冲去，把机枪连打垮，进了禁门关，袁旅率领少数溃兵向雅安逃去。

红军攻克紫石关和沙坪之后，沿顺河村山脚抵天全城郊大岗山西麓，即向模范师郭勋祺所部进攻。另一支红军徒涉天全河夺取了城南浮桥，向天全城内敌军发起进攻，两面夹击。仅两天的战斗就粉碎了郭勋祺曾夸口的“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过天全”的呓语，夹着尾巴狼狈向雅安方向溃逃。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天全的简况

丹 史

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中央红军在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等地，进入川康边境。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时，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对于中国的革命的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错误地主张南下，率领红四方面军由阿坝地区出发，总部亦在十一月中旬，迁至天全县境的程家窝村。

红四方面军总部，是红四方面军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机关。共设三个大部，一、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付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付主任傅种，供给部长郑义斋。二、司令部：下辖组织部、宣传部、群众工作部、保卫局。有时保卫局是独立的。

当时，总部的任务是：一是打仗，二是地方建设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百丈关战斗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参战部队仍撤回天、芦、宝地方，稍事休息后准备北上。总部亦从天全转至芦山的大川、双河乡。

注：此资料是根据原成都军区付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接见我们时的回忆片断整理。长征时期，陈明义同志来天全，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

解放初期中共天全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工作

胡运贵

解放初，土改前后一段时间里，中共天全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工作十分活跃。当时，已配备了兼职新闻干事，并初步建立了通讯员网，明确要求每个通讯员每月给《西康日报》写稿两篇，随着“四大运动”、和土改的开展，给通讯员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激发了他们写稿的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给报社投过稿的干部、职工、农民就有四十多人，其中投稿次数多的有十多人，特别是芦登谷、刘沉弓、赵涵、胡光孝、詹其型、裴大元等几位同志的报道工作更为出色。他们所写的稿件一是上报率高，二是报道面广。所刊登的稿件中有反映农民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中农民怎样同土匪、恶霸地主作斗争，取得胜利的报道；有反映土改以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的报道；有反映人民法庭开庭公审、判处反革命分子的报道；有反映翻身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踊跃交纳公粮的报道；有反映人民银行为解决农民的困难，发行贷款的报道；有反映解放后天全县工商业欣欣向荣、商人踊跃交纳营业税的报道；也有反映天全发展种植业的报道，还有反映团县委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报道等等。这些稿件生动地反映了我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铲除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基础，解放了生产力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稿件的报道，也促进了各个运动的开展。

一九五四年，天全县委宣传部为了加强通讯队伍的建设，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五个通讯小组。四至六月在二区、四区及始阳劳动村建立三个通讯小组，七至九月建立财经通讯小组和永兴通讯组。具体的作法是：①在建立通讯小组的地方，首先与当地党委共同研究，取得他们的指导和支持；②主动和比较积极的通讯员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同一般通讯员取得联系；③通讯小组建立后要制定简单的报道计划，开展报道工作；④每一阶段工作结束后要进行总结，交流经验；⑤组织通讯员学习写作知识；⑥经常同编辑部联系，研究稿件。此外，县委宣传部还决定由裴大元负责同财经部门的通讯联系，芦登谷负责同二区、四区、始阳劳动村

通讯组联系，宣传部还明确规定通讯员每月至少给西康日报写两篇稿件。

一九五四年五月九日，财经通讯小组正式成立，确定由县委曹均明、政府唐雨栋、胡隆生、税务局王炳霖；粮食局陈和礼；银行陈代荣；县联社杨克煌、周才楷、徐桂成等九人为财经组通讯员，按期给报社写稿。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日，天全县委宣传部提出了“关于加强通讯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①各机关、各区乡党委（组）要加强对通讯组织和通讯员的领导；②要培训农民通讯员，对农民通讯员写稿中的困难要作具体帮助。各区乡要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并及时上报宣传部。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天全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县级机关通讯员会议，到会的通讯员有14人。会上由宣传部长作了动员报告，批评了合省后（1955年10月西康与四川合省）通讯员思想上产生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出了通讯报道任务，并决定在县级机关成立七个通讯小组，各组推选出组长，由宣传部每月召集开一次会，检查全月报道情况，研究报导方面的有关问题。

会后有七个通讯组先后建立起来。这七个通讯组是：县委通讯组、政法通讯组、生产通讯组、合作通讯组、茶厂通讯组、财经通讯组、文教通讯组。这些通讯组的建立，推动了当时新闻报道工作的开展。

天全县血吸虫病流行记略

刘 德 天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疫区人民健康，阻碍生产发展的地方性传染病。据“马王堆”西汉女尸肠组织上发现血吸虫卵，证明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解放前江南沿海一带血吸虫病流行猖獗，不少地方已成了“罗汉村”、“寡妇村”、“无人村”，到处是“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

血吸虫病在天全流行已久，人们对患病症状十分熟悉，称谓颇多。永盛、新华一带对晚期血吸虫病称“水蛊胀”、“管箕胀”、“大肚子”、也有称“百日胀”、“千日胀”。始阳、乐英和城厢一带，除上述种种称谓之外，常统称“胀病”。

天全县血吸虫病流行史尚未查清。但根据调查追溯，在清末民初该病流行已造成一个村庄毁灭和几个农庄的数十户人死绝的惨状，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生命，摧残农村劳力的严重地方病之一。新华乡落改村（今落霞村）的“山脚下”，有一个三十余户和百余人口的山村，后因血吸虫病猖獗流行，村里十个男子九个肚子大，十个妇女九个不孕，人口一年年减少，田地一片片荒芜，在民国建立之前就已成为一片废墟。至今“山脚下”遗址、房基和灶台依稀可辨，地中瓦砾甚多，偶尔还能见遗留的基石。上落霞坝原名叫“石岗子”，以其附近有采石场得名，是个富庶之地，民国初年这里住有八十余户人家，近

四百多人，房联檐接自成一条街，是临近几村中较大的村之一。民国十年左右，这里便出现了“大肚子病”，但发病人数不多。到约民国二十年左右，“大肚子病”大批发生，几乎家家有病人，每年都要死去五、六人，死者大多数都是骨瘦如柴和腹大似鼓的青壮年。民国三十年后“大肚子病”流行极盛，不但连续几年见不到婴儿降生，甚至“抬丧”也难请到精壮劳力。到了解放前夕，“石岗子”已是户不足四十，人不满两百，到处是墙倒房塌十室九空的凄凉情景。当地人称为“死岗子”。

过去人们对血吸虫病没有认识，加上经济贫困，一旦感染上血吸虫病，无医少药，个个都九死一生，听天由命。因此凡患了血吸虫病的人都视为“不治之症”，称谓“蛊胀病能治得好，三塔菇也栽得活。”有的患病后怪风水不好，求神拜佛到处可见。在石岗子还盛行锯门槛。即患蛊胀病死者的人家，出殡前都先将堂屋门槛锯断，出殡时用脚蹬掉才抬棺出门。棺材浮厝野地，三年内家人中不再发生蛊胀病，则择期葬棺，新换门坎。以此寄托心愿，期望剋凶化吉，消灾免难。可是一户户的门槛锯去了，蛊胀病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病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从未见到谁家转过好运，自然也就没有谁家能换上新的门槛。当时流行一首民谣，“人患蛊胀病，已进阴司门，虽生犹如死，枉为今世人”，真实地反映了病区人民深受其害、痛楚莫及的悲惨情景和求生渴望。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深入持久地开展“送瘟神”的群众运动。经过二十八年的坚持不懈斗争，查清了病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螺面病人得到了大幅度减少和压缩，全县十六个血吸虫病流行乡（镇）已有十个乡（镇）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一万七千多患者得到了治疗，挽救了一批濒于死亡的晚期病人的生命。增强了疫区人民的体质，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麻疯病治疗成效显著

王正贵

麻疯病是由麻疯杆菌引起的，通过皮肤或粘膜传染，并以皮肤和周围神经损害为主要表现的慢性传染病。据祖国医籍记载，该病在我国流行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多年。

麻疯病杆菌的生命力极弱，离开人体即不能存活。非密切接触并有皮肤或粘膜破损条件不受传染。然而由于中国历史上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劳动人民长期被剥削压迫，贫病交加，身体抵抗力减弱，成为易感人群。加之战乱灾荒不断，灾区群众流离失所，频繁迁徙，拥挤度难，增加了传播和受染机会，致使麻疯病在全国各地都有流行。

天全阴湿多雨，气候条件宜于麻疯杆菌生存。更因过去群众生活普遍贫困，卫生条件极差，生活习俗不良，麻疯病分布广及各县，且发病率较高。由于经济贫困和缺医少药，凡病者都只能听天由命，绝少得到治疗。久之，病理损害造成面容丑陋，肢体畸形甚至残废，进而丧失劳动能力，使人望而生畏。正因如此，麻疯病人倍受歧视和虐待，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杀

戮。在天全，火烧、活埋、推下河、推下岩活杀病人的事例，旧社会时有所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对麻疯病的防治，多次召开全国性的专题会议，不断制定防治工作规划和技术措施，建立领导组织，设置防治机构，配训防治人员，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方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本县防治麻风病的工作自一九五八年七月开始。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民政、卫生、商业、粮食、公安部门紧密配合，各乡党政领导大力支持，卫生人员积极努力，经过二十八年的防治，已基本控制了流行。一九五八年普查时，共确诊患者四十四人，发病率高达十万分之六十一·四。因为该病潜伏期长，一般为二至五年，个别可以长达四十年，故继后连年均有新发病例。一九五九至一九八二年共陆续发病四十九人，连同五八年确诊人数，累计病人达九十三人。在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防治方针指引下，康复医院和各乡卫生院坚持年年进行线索调查，及时收容入村，有效地减少了传染。从一九八三年起已再未出现新病人。先后收容入村的病人经过治疗后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家园与亲人团聚。截至一九八五年底，全县尚有现症病人二十七人，其中三人在家，二十四人在村。在村的二十四人中，二十人经本治愈，菌检阴性，其中八人达到治愈标准，经过进一步地观察鉴定便可出村。

短短二十八年中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是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关怀分不开的。一九五八年调查工作一开始，县委和县政府便亲自召开会议，亲自布置安排，亲自检查督促，有力地促进了工作，仅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十七个乡的线索调查和一百三十二名疑似患者的重点复查，确诊了四十四名。九月，县委五人小组成员实地勘察，在梅岭公社向阳村选定了麻疯村地址。责成公社党委迁移居民，维修房屋，于十月份建起了麻疯村。同期县委指示由民政科、卫生科、粮食局、商业局、公安局和城厢公社（其时梅岭乡属城厢公社所辖）主要负责人，共同成立由七人组成的“天全县麻疯病防治委员会”，具体解决病人入村后的生产、生活、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在各部门各公社的积极支持配合下，于十二月份尽数将病患者收容入村。为增加麻疯村的农副业收入，以补充不足并改善病员生活，政府拨款为麻疯村购置了生产、生活用具，并贷款给买种、买猪、买鸡、买材料，在短期内办起了竹编业、养殖业和农业。随着收入增加，村内贯彻按劳付酬的原则，按月给病人评发零用。麻疯病人的主副食品一直由国家包干，每月大米三十斤，其余副食按国家规定标准供应，生活费由民政局按月支付。病员的单衣、棉衣、棉裤、被盖，由民政局根据需要与可能，定期不定期的补充，原则上缺啥发啥。医疗费全免，每年约支出五、六千元，由卫生科在卫生事业费中支付。至于麻疯村从事农付业生产所得收入，完全由康复医院代管，用于增加生产、卫生设施，改善病员生活。由于政府照顾周全，多数病员思想安定，以村为家，积极主动配合治疗，病情好转十分迅速。

鉴于麻疯村地址距离县城过近，且周围居民也较密集。为加强防范并利于管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麻疯村迁地址沙坪公社“海子坪”该地山高雾大，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迁入至一九七三年，先后死亡八个病人，其余病人的病情也不同程度地恶化。县委接到报告后立即通知民政、卫生、公安部门联合重新勘察，并拨款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在“火夹沟”新修了房舍，赶在冬令之前将病人迁移到新址。为加强对病人的思想教育并加强对康复医院的管理，一九七五年县革命委员会正式任命康复医院院长，距今，院长已经历了三任。

康复医院设置于距离麻疯村一公里的地方，医务人员每二至三天入村诊疗一次，遇有紧

急情况则随喊随去。治疗措施上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针，春夏季以新药为主，秋冬季以中药为主。新药主药为苯丙砒和氨苯砒，近年来采用利福定效果也佳。中药主药为“Ⅰ号加减扫风散”和“Ⅱ号加味扫风散”，前者用于瘤型，后者用于结核样型。无论使用新药、中药，治疗过程中均同时配合针灸和普鲁卡因封闭治疗，以强壮身体、矫正畸形和减少副反应。实践证明：坚持中医结合原则，并严格按照不同情况辨证施治，经过一年至两年，多数病人都可治愈。例如病人王雷氏，三十岁时患瘤型麻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入村时，病程已达十年。面部红肿，眉毛脱尽，口眼歪斜，结膜出血，视力减退，耳大神经和尺神经肿大，面部及全身皮肤有大小不等的结节，且多数溃烂，手指挛曲不能伸直，末节全部脱落，右足趾完全脱落，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菌检强阳性（+++）。入村后即以Ⅱ号扫风散治疗，同时给予维生素B、C内服，运用穴位封闭。四个月後能自理饮食。六个月后溃瘤结痂，结节消灭，视力改善，能从事轻微劳动。继续进行半年的抗复发治疗后，体质恢复，菌检阴性而出院。类似病例甚多，六十至七十年代治愈回家的十五名患者，一般都未超过三年。

二十八年后今天，麻疯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表现在新发病人逐年减少并连续两年无发病。虽然个别潜伏期较长的病人尚未被发现，但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住和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危险性大大减少。即便发病，治疗也十分有效。一九八四年对原来发病最高的两路乡普查，结果连疑似患者也未发现，不难预测，再过十年八年，麻疯病将在全县绝迹。

天全茶叶史初探之三

杨仁飞

从唐以来，汉藏之间的关系，能逐步得到发展，都是借“茶马互市”为媒介。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各自需要不同，在“茶”“马”问题上各自采取的利用手段——政策也就各有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共同之点，那就是藏人在生活中离不开“茶”。《明史·食货志》“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四川通志·茶法》“茶乃番人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所谓羁縻者，乃牵制、笼络之谓也。以甚么东西来羁縻呢？除政治上采用一些措施之外，主要就是通过茶。这从天全杨土司势力的扩展情况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按唐末吐蕃与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都先后侵扰巂（今越西地）黎（今汉源）雅（今雅安地）一带。而当时领有今汉源一带的郝王，和领有泸定沈村一带的刘王及据有碉门一带的杨王（即天全杨土司）归附朝廷，而实际上他们又与吐蕃和南诏都有联系。于是三王领地上可得到唐政府的保护，下又不受吐蕃、南诏的侵扰，这就既使自己的统治政权得到合法保护，又可以与南诏、吐蕃保持商业上的交通贸易。而据有地处“南诏咽喉”——碉门的杨土司，为了掌握蕃茶市场经营的主动权，首先就另行开辟鱼通、岩州（今泸定、岚安）、打箭炉（今康定）茶路，（此路岩多、狭险，一般不能驮运，多以人力背负，在当时即称谓小路，通过这一路的茶叶叫“小路茶”）。（关于这条茶路，先后尚有变动，本文不作多的叙述。）后来沿着这条路又派大头人进驻岩州，在那里作土司。元初，岩州土司高宝锡（即杨土司派出的头人）迎降有

功，获授天全六蕃招讨使，三王与穆坪（今宝兴地）诸小头目皆受节制。以后在明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公元一三八八年三月）礼部主事高惟善自长河西（今石棉、泸定这一段大渡河以西）鱼通（今鱼通）宁远（今乾宁）。也有说在今磨西以下到石棉一带等处回朝汇报工作，他本是明正土司家理问，对边区情况了解很清楚，给明朝大皇帝提了六条建议：“通乌斯藏、朵甘（均指藏族地区）镇抚长河西，可拓地四百余里，得番民二千余户，非惟黎、雅之保障，蜀（四川）亦永无西顾之忧。一也。番民所处老恩冈[刚]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易，碛门之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贍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二也。……天全六蕃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免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蕃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箭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壤，归市必众。四也。岩州既立仓易马，则番民运茶出境倍收其税，其余物货至者必多，……五也。碛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六也。”这说明明代统治者对边境的开拓和巩固是费了一番脑筋，并研究怎样才能发挥“茶”和“茶市”的作用，并且对“茶路”的选择也是相当考究的。但由于当时碛门是后蜀屏障、南诏咽喉，所以尽管四川岩州卫于洪武二十二年六月（一三八九年七月）奏：“每岁长河西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其路由本卫经黎州始达茶马司，茶马司定价，每堪中一匹，给茶一千八百斤，令于碛门茶课司支給，不惟番商往复路远，实给茶太多。今宜量减马价，移置茶马司于岩州，将碛门茶课司所贮茶运至于此，马至则验马之高下以茶给之”。而朝廷考虑结果“诏茶马司仍旧，惟定其价上马一匹与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驹马五十斤，蕃商有不愿者听”。茶马司移岩州之议遂废。但因碛门经岩州至长河口道路险隘，往来跋涉维艰，市马较难，影响朝廷的易马数，乃于洪武三十年二月一九三八年三月命左都督徐增寿“檄所司（天全六蕃招讨司）开拓”自碛门出枯木任场径抵长河口通杂道（今咱里河东岸）长官司的道路。这就是修公路前翻马鞍山的道路。

就以上发展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清以前的统治者们，对待边境的少数民族，不管是“用茶赏赐”、“以茶易马”、“茶马互市”、“茶市贸易”，问题的核心就是“茶”、“和“茶路和茶市”。随着时代的转换和形势的发展，茶市也就逐渐西移，最后移至打箭炉，成为一个茶市口岸。

从历代王朝看，唐代国势强盛，各少数民族朝贡，用茶赏赐，藉以笼络，当然也允许以马换茶；宋代国势衰弱，急待充实国力，迫切需要战马，所以集中茶叶贮边易马就显得突出；元代本身自有标悍骑兵，对马不那么需要，就只是“置榷场于碛门、黎州与吐蕃易马”明代则是“以茶易马用制羌戎”；而清代皇帝来自东北少数民族，自己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而且对少数民族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建国初，国力强盛，对马匹的需要，就没有宋、明两代那么急，但有见于宋、明时代对边境少数民族那样的控制办法，对自己也有利，所以开始还是沿用“以茶易马”，但只是在陕甘地区去选择好马。与此同时，它又发觉明代由于犯私茶，造成“马贱茶贵”，导致茶叶“年久遏滞”，不是命令全部变卖，就是折付军饷，或易换粮食，以作戍边粮。由于这些原因，反正它又不急需马，于是命令“停止以茶易马”而改成“设引招商”自己收税，并制定出一套严密的“引岸制度”。其实这也不是清

代独创,宋赵开提出“设引招商”,明代“令商人纳钱请引”。而这些被招的商,纳钱的商都不任其沤烂、无边无际地去经营茶叶的商人。而是事先登记申请,被核准后,到户部泉宝局领取“引”“由”,“年办年销”,“行过残引缴部”。领得“引”、“由”者按引缴税,这种商人,可以世代经营,除非“人亡产绝”是不得另招承办的,只有在商人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这种商人即名为“部引官商”。

甚么是“引”、“由”呢?前而本文之二已提及,它是茶叶税票,是茶叶数量和纳税金额的凭证。明代时有腹引、边引。所谓腹引是指内销茶叶用引,而边引则是针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边销茶叶用引。在清代则又加上一项“土引”,这是专指天全六番招讨司采、制运销茶叶的茶引。甚么是“岸”呢?简单说就是指茶叶销售的地点(也包括途)。就其整个“引岸制度”来说,实际还规定了产地,产量(包括产量和加工能量)和销地必须对口,甚至还规定了它指定的运销路线。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四川通志·茶法》中说:“皇清(指清代)四川省原额新增边、腹、土引茶课。茶税银量数目以及收买、发卖州县逐一分晰备载于左:”(略)现只将其举数例于下:

(1)成都县原额边引二千二百六十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一千六十六两七钱二分,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二百八十二两五钱。于灌县、彭县、汶川等县买茶至松潘发卖。原额腹引四百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征税银二钱五分,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五十两,于洪雅县,大邑、灌县、彭县等县买茶,至本县发卖。

(2)荣经县原额边引一万九千五百一十四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九千二百一十一两六钱八厘,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二千四百三十九两二钱五分,于本县买茶至打箭炉发卖。原额腹引四十九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税银一十二两二钱五分,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六两一钱二分五厘,于本县买茶至清溪发卖。

(3)天全州原额土引一万七千八百四十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征税银三钱六分一厘,共征税银六千四百四十两二钱四分,每张运茶一百斤,随带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课银二千二百三十两,于本州买茶,至打箭炉发卖。新增土引七百张,共征税银二百五十二两七钱,共榷课银八十七两五钱,于本州买茶至打箭炉发卖。

(4)灌县……新增边引二百张,于本县买茶,代销通江五十引,巴州一百引,南江五十引,至松潘发卖。

另外在嘉庆戊寅年(公元一八一八年)编纂邛州志载:嘉庆十七年现行边引二万零三百张于本州买茶由禁门关(天全禁门关)泸定桥(泸定)炉关(康定茶关)盘验截角至打箭炉(康定)发卖。共榷征银七千五百五十九两五钱;现行腹引五百张于本州买茶,由州属南河坎盘验截角至资州、简州、仁寿、彭山、内江、双流、蓬溪、遂宁八州县发卖。共征银二百九十六两五钱……解盐道完纳。

从上面看,我们可以看出(1)本县不产茶,认引后在指定地点买茶,加工后到指定地点卖,如成都县边引在灌县、彭县汶川等地买茶,加工后要到松潘卖;腹引在洪雅、大邑、灌县、彭县等地买茶,加工后就在本县买。

(2)本县产茶,认引后就在本县买茶,加工后就在本县卖。如南川边引,崇庆州腹引

等，芦山腹引。天全土引等。

(4) 本县有茶而茶引不够，代销外县茶引到指定地点卖茶。如灌县新增边引代销通江、巴州、南江等县茶引。

当然以后也有些原为西路茶而改为南路茶的。

总计全省原额新增边引共69522张，其中

西路茶引10496张

南路茶引59026张

腹引4992张

土引18540张

合计93054张

天全土引18540张是属于南路茶引，因此实际南路茶引应该为67,566张。就其比例来说西路茶引占全省总茶引11.27%，南路茶引占全省总茶引88.73%，天全土引占南路茶引27.31%，占全省茶引19.92%。从以上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四川茶叶，南路边引占全省总数约五分之四，而天全土引则占南路边引（含土引）四分之一还多。按每引行茶一百斤、附茶十四斤计算则当时天全茶叶产量即有2,113,760斤，总合21137.6担。这个数字是成立在雍正八年（1730年）汇总的较前一点的数。再据《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五属认领行销的南边茶引：

雅安	27,860引	荣经	23,314引
天全土引	31,120引	名山	1,830引
邛崃	20,300引		
共	为	104,424引	

以天全茶叶来说，其引张变化过程据《天全州志》载：从明到康熙三十一年天全“额行土引700张”康熙四十年奉上谕“行销土引11595张”，雍正六、七年请增引10516张，合为22111张，雍正十三年在天全认领天全土引的陕西商人邓、袁姓等六人，积欠茶课税银逃亡无着，累积州人。乾隆元年乃清飞拨5617张于崇宁、什邡、安县、彭县、石泉等处代销，天全实存引16494张。此后皆按年疏销，无有积滞，茶引畅销，商人趋先牟利，都争先认领天全土引。从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年，有承办、派办、墨办、增办等各邑照票，又挂截邛州边引20300张，挂截名山边引1134张，因此遂一度增至47000张，当然这中间有些就不是正式土引，而是他引改岸。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年商人们为了取得经营茶叶的合法权利——“天全七引”，乃向上面一再请引；又因巴勒布廓尔喀（指全川）两次用番兵，番民，承运军需犹得偿资脚价，用茶较多最后把天全土引增加14,636张，合原来的天全存引共为3,120张，引票愈多，需要茶叶愈多，对茶株的采摘也就愈甚。而茶园发展又跟不上去，树老枝枯、茶叶配销就日益困难。加之售岸壅塞，至使商力困乏，历年税银无法完清。嘉庆七年至二十三年拖欠总茶课银（包括课银、税银、羡银、截银等）七万多两。时天全州守方同煦公查得“售岸销滞、商力困乏，均由引票太多之故。”时有“无引较清平”之谣，正是当时情景。二十五年，方公集商议原，经四川总督蒋攸銓查明奏减茶引9009张，朱批依议。至此，天全实行茶引22111张。按蒋某的奏减折子倒还不是单纯为减轻天全茶商负担，使天全茶叶能比较合理发展，主要也是维护着朝廷所定茶法的利益的。他在请减的同时说：“该州茶商二百余名，多系拖欠之人，本应全行革退，另招他商承办，惟茶引请减外，尚余应行引二万二千

一百一十一引，纳税不少，恐一时乏人承办，有碍口外番民日食之需，臣已飭该管盐道督同该州于各商内择其家道稍殷，未经欠课及欠课最少已经完纳之人，酌留四、五十人，责分认前项引张，按年行销纳课。其二十四年分……同二十五年分领回增加引九千零九张均自本年起分作六年均匀带销，不得短少。……其未完报部数、截银两，仍照例参追”。不过尽管这样，这次奏减引张，对天全茶叶的实际发展来说也是相适应的。假如我们以增引后 32120 引计算，就是 32,120 担茶，加上每引附茶 14 斤（0.14 担）就是 36,618.8 担茶，如果以最多时期引张增至 47000 多张计算，那就是 4700 多担，加上附茶则为 53,640 多担。那吗，天全在清代乾、嘉时期是否能产到 5 万多担茶呢？看来是不实在的。因为（1）增引至 32120 引后，“渐次茶不敷引”，“商众拖欠课银七万多两”；（2）当时的各邑照票和挂截外州县引张不一定都是天全本地茶叶，只是利用天全这个有利的运销市场（运销也属于岸，但茶市西移到打箭炉后，天全逐渐不是销售茶叶口岸了），将他茶移岸；（2）是运茶是在天全加工成茶包，因天全从明洪武年间已令天全专制乌茶，清初天全最先设架口制成茶包；（关于这点以后还要谈），（3）是天全上引税银只有 0.361 两，而边引税银每引是 0.472 两，每引少上税银 0.11 两。趋利者众，引张增多，势所必然。但至低限度也可以说明那时通过天全再销售的茶叶已达到五万多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减引后所存的 22,111 引是康熙四十年行销的 11,595 引加上雍正六、七年请增的 10,516 引的茶引数，而不含其他的任何形式和原因所增加的引数在内，跟天全实产茶叶配销能力是较吻合的。所以减引后商众指天以誓曰“世世无素章程，渝则神殊殛之。”这正说明当时天全实产茶叶已应该有 22,111 担，加附茶每引 0.14 担合为 25,206.54 担。但这种情况亦未长期稳定，清代晚期由于列强入侵，特别是光绪年间由于印度茶叶倾销全省茶引减为 80,000 引，天全茶叶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

记抗战初期的天全抗日死难先辈

王永熙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振臂疾呼要求抗日，不愿做亡国奴，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抗日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国民党政府被迫应战，调兵遣将开赴前线。士气高涨，振奋人心，天全虽远离战火，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展开了抗日活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城内街头随即出现了大幅标语“拥护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了宣传队，除在街头小巷演讲外，还深入到乡下发动群众支援抗战，仅八月底，天全就掀起自愿报名从军的热潮。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我幼稚年小的心中还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踊跃参加过街头宣传和下乡动员的活动。青年们报名从军，我也天天去看报名，记得报名的有徐楠、苟永洁、高孟全（南街）周宗涛、（中街）周孟福、（北街）牟正兵、（东街）高仕泽、（草鞋市）杨再文、（响水溪）张国斌等一百多人。离开天全时举办了欢送大

会，由县长张肇弟主持。县城人民夹道欢送，队长高孟全披红戴花，带领全体从军子弟，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街头经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和鞭炮声震动了整个县城。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亲戚朋友也来相送，一直送到东郊“接官亭”。到乐山体检后送重庆行营分地培训就出川，到前线补充前沿阵地守军，转战在中原和大江南北，这是第一次自愿从军。后来国民党政府正式命令征兵（公元1938年），分配天全招兵名额是六百名，实际控制名额是三百名，结果又有很多人自愿应征，名额达到四百六十七名。前前后后天全为抗日战争去当兵的有千人以上。很多人在战场上为国牺牲了。听说当时国民党政府通知天全县政府为国牺牲者名单上就有两百多人，其中有高在天、张天寿、高孟全等人，也曾经慰问过他们的家属，发放过优抚金及物资。高孟全的儿子高扬说，他家领过盐巴、布、毛巾等物质，但仅是一次。先烈们有知今日的中国，今天的天全是阳光灿烂、欣欣向荣的，亦当含笑于九泉之下。

（一）高在天喋血南翔

高在天是天全东城人，当时在川军杨森部队二十军某团当连长。“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展开后，杨部由贵州调赴上海，接防张治中将军所部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驻守南翔蕴藻滨阵地时，日寇以的立足未稳，立即发动猛烈攻势，川军将士没有坦克、大炮，凭着川造新式枪及大刀与日军相拚、坚守阵地。高在天所在团，伤亡惨重，团长和营长二人战死，十二位连长仅余三人，士兵牺牲更多，高在天英勇殉职，在其身边的天全籍中士张天寿也同时牺牲了。后来该连的准尉司书彭举给舅父王去非写信道：“战事之惨烈，空前未有，高连长亲率士兵冲锋几次，稳着阵脚，不幸最后壮烈牺牲。我在场见到高连长血染沙场，恨自己没能同高连长一样为国牺牲，非常遗憾。高在天是个爱国军人，不置家产，廉洁奉公，深得士兵的爱戴，他的牺牲使与他相识的人都为之惋惜。国民党政府曾通知当时天全县政府定为抗战阵亡将士，家属亦得过抚恤待遇，但是很少，不久就连烈士名字也湮没了。”

（二）邱春如抱恨湖北省谷城县

邱春如系天全军城人士，幼军聪颖过人，好读书喜弄墨，旧文学有一定的根基。民国初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校，与邓锡候、田颂尧、李其相、孙震、王铭章等同学为伍。因为他是书生意气，不善投机取巧，不忍残害人民，不愿聚敛钱财，虽任职团长也不占地称王。抗战初，随王铭章集团军出川，因病，留襄阳兵站时任上校参谋，可事必躬亲，日夜辛劳，致使病情加重，又闻王铭章将军在滕县与敌鏖战中牺牲，更是悲感交集越发病入膏肓，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联，那上联写得情真意切，大有“功果未成，常使英雄泪襟衣”之状，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谁是有心人，可惜一腔热血未偕王将军洒于前线。”充分表达了未战沙场的遗憾心情。他的内疾更使我们感到他是一位爱国的军人，他也是为抗战带病工作，日夜辛劳而死的，后来天全县政府也曾对其遗属进行过抚慰。

时代变迁的史诗

杨 光 辉

一、童 年

记忆中的山村，
村前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
一头插进林海，
一头栽到公路。
在雪花纷飞，
凄凄惨惨的黄昏，
隐隐约约看到：
一间间破烂草屋。
在那难忘的岁月里，
被绑在土地上的主人，
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当奴仆。
那些贼眼溜溜的老鼠，
死死盯住了救命的红苕苞谷。
那些吸血的苍蝇臭虫，
更是无孔不入。
那些瘦骨嶙峋的烟鬼，
不惜倾家荡产，
卖儿卖女，
却倾倒在“黑女人”的裙下，
接吻麻木。

注：“黑女人”指鸦片烟

村后那棵松树，
在风雪的午夜，
挂满了希望的泪珠。

二、少 年

憧憬中的山村，
霹雳一声，

天地翻复，
冬去春来，
万物复苏。
晨光送走了黑暗，
小路迎来了光明。
喜鹊的欢歌，
唤醒了梦中的主人，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快去！
快去！
迎接我们心中最尊敬的仆人。
青山露出笑容，
小路特别高兴。

仆人有一颗红亮的心，
把春天的温暖送进了山村；
仆人有真善美的灵魂，
治愈了流行的疾病，
铲除了人间的不平；
仆人有清道夫的本能，
把苍蝇臭虫老鼠横扫干净；
仆人有月下老人的善心，
把人类最美好的幸福，
送给了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
仆人有包青天的本领，
把“黑女人”当众火焚。
主人和仆人，
在东方红的凯歌声中，
跳起了欢乐的丰收舞，
庆祝：
大地回春！
村后那棵松树，
在春天的早晨，
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盈。

三、青 年

梦幻中的山村，

腥风血雨
迷雾沉沉。
村前的小路，
螃蟹横行。
已消灭的幽灵，
又借尸还魂。
千奇百怪，
中外震惊。
拉开红海洋的序幕，
一队队螃蟹，
呼风唤雨，
它们：
带着“兵”字袖章、
高举“最”字大旗，
唱出“杀”字歌声。
跳起“忠”字舞蹈，
踏着“民族”的灵魂，
演出：打、砸、抢、抄、抓。
“完全”彻底“干净”，
神州大舞台：
地暗天昏，
日月不明。
谬误变成了真理，
公仆变成了囚徒，
主人遭到了不幸。
母亲在啼哭，
儿女受欺凌。
村后那棵松枝，
在风雪的黎明，
禁不住泪如雨淋。

四、中 年

理想中的山村，
四五运动，
拨开迷雾，
十月惊雷，
山村复苏，
阳光的沐浴。

又迈开新步杜
满山遍野的，鹃花，
把最美的花儿，
送给车大哥，
为腾飞开路；
把最大的花儿，
送给夜明珠，
为新瓦房祝福；
把最红的花儿，
送给沉睡千年的地下人，
为四化献身；
把最香的花儿，
送给百灵鸟，
为农家乐配音；
把最艳的花儿，
送给电哥哥，
把国家大事，
送到家家户户。
主人和仆人，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
更加聪明，
用勤劳的汗水，
智慧的双手，
又绘出一个“春”
村后那棵松树，
在第二个春天里，
幸福的热泪眶盈。

一九八六、十、一日

记《永慎图书馆》

罗开极

天全图书馆原名永慎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停馆结束。它的设立经过曲折复杂的情形，应先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四川涝灾说起。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天全，淫雨成灾。十之六、七的山坡五陵减产，平坝地区亦减产四、五